

# 僧伽信仰的兴衰轨迹及其原因探析<sup>\*</sup>

谢志斌 李继武

僧伽信仰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演变过程。僧伽作为域外来华僧人，自唐中宗时期至清末千余年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崇拜，从最初的域外胡僧发展成为中国民间集各种神职功能于一体的著名神灵，展现了外来佛教信仰载体彻底和全面中国化的过程。唐代时期，在政权的大力支持下僧伽信仰兴起并快速发展。五代战乱中，对护国信仰的需求促使僧伽信仰持续升温并得到巩固。两宋时期，在社会各阶层的共同推动下僧伽信仰全面发展并到达鼎盛。明清时期，由于其他信仰对僧伽信仰的吸收与消解，僧伽信仰发生转型并渐趋没落，最终归于沉寂。僧伽信仰的兴衰轨迹反映出了中国佛教信仰重心的转移和中国民众宗教信仰情趣的变迁，并由此可见宗教信仰的命运与政权运作、文化发展、民众需求之间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僧伽 泗州 中国化 佛教

作者 谢志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后；李继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僧伽是唐代著名的域外来华传法僧，关于僧伽其人，历代文献记载颇多。最早见于唐李邕的《大唐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sup>①</sup>，之后有《太平广记·僧伽大师》<sup>②</sup>《宋高僧传·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sup>③</sup>《泗州大圣明觉普照国师传》<sup>④</sup>《神僧传·僧伽》<sup>⑤</sup>等影响较大。僧伽乃“葱岭北何国人”，龙朔初年（661），“始至西凉府，次历江淮”，展示“现十一面观音形”等神迹，在民间赢得很高声誉，“猗德名也，已闻于天”，中宗下诏请入内道场“特加礼数”。僧伽在长安“应诏以瓶水致雨畿内”，治驸马都尉之疾，“声振天邑”。景龙四年（710），“于京荐福寺”“俨然坐亡”。僧伽去世后，“多现灵迹”，被传为“观音菩萨化身”。此后，僧伽得到帝王推崇、文人褒扬、僧侣赞襄、民众信奉，影响力不断扩展，逐渐成为与佛教观音信仰以及道教信仰、民间信仰紧密结合的“泗州大圣”，流传甚广。僧伽信仰还远播日本、朝鲜半岛等地区，其信仰遗迹至今犹存。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宋代民间观音信仰研究”（项目号：19XJC73000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伊斯兰视域下的宗教对话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号：18ZDA234）的阶段性成果。

- ①（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九《大唐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中华书局，1982年，第4529-4530页。据赵明诚《金石录》卷六记载“第一千一百十八《唐普照王寺碑》李邕撰并行书，开元二十四年二月，咸通中重刻。”赵明诚《金石录》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1册史部439，第192页。
- ②（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九六“僧伽大师”，中华书局，1961年，第638页。
- ③（宋）赞宁《高僧传》卷一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大正藏》第50册，第822页上。
- ④（宋）蒋之奇《泗州大圣明觉普照国师传》，明万历十九年李元嗣刻本，载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
- ⑤（明）《神僧传·僧伽》，《大正藏》第50册，第992页上。

现代学术界关于僧伽的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也出现零星成果。直到2003年，“泗州大圣”舍利在江阴出土，僧伽开始引起学者和宗教界人士的重视，研究成果陆续涌现。尤其是2017年4月“僧伽大师与佛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在南通召开，150余位学者围绕僧伽生平、僧伽信仰、僧伽造像、僧伽与“一带一路”等话题展开研讨，成果颇丰。<sup>①</sup>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名闻遐迩、在佛教发展史上举足轻重、与中国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僧伽信仰，如何形成并逐渐发展，又为何退出信仰舞台以至鲜为人知。这些问题有着复杂、深刻的历史原因。从现有文献和现存遗迹等信息挖掘僧伽信仰兴起的背景，梳理僧伽信仰兴衰的轨迹，探究僧伽信仰没落的原因，对深入理解佛教中国化、考察佛教信仰的多层次特征、厘清佛道教的相互关系、探析中国民间人神崇拜等有重要意义。

## 一、唐代在政权的支持下僧伽信仰兴起并快速发展

唐代是僧伽信仰的兴起阶段，也是僧伽信仰内涵特征塑造的重要时期。僧伽入华后，据说于江淮地区多次显示神异，在民间声名大振。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僧伽奉诏到长安，赴内道场，“帝及百僚皆称弟子”，享有“国师”之尊<sup>②</sup>。僧伽圆寂之后，中宗“仰慕不忘”，并亲自恭送其遗体出城。传说永泰年间（765-766），因僧伽现身皇宫，代宗特减免对普光王寺的赋税，并请画僧伽真容至内廷供奉<sup>③</sup>。穆宗时，王智兴建议在泗州普光王寺建立戒坛，穆宗不顾李德裕的反对，特准设坛<sup>④</sup>。懿宗时，庞勋起义，攻打泗州城。据记载，在敌军将至的危急关头，僧伽于塔顶显形警示，城中军队连夜出击，庞勋队伍惊窜而败。此事奏闻朝廷，懿宗敕赐僧伽“证圣大师”<sup>⑤</sup>之号。由此可见，从中宗开始，代宗、穆宗、懿宗等多位帝王对僧伽礼敬推崇，于泗州普光王寺恩宠有加，为僧伽信仰的快速发展和普及有很大推动作用。

由于皇室的大力支持，僧伽信仰以泗州为中心得到了快速发展，泗州普光王寺遂成为天下名刹和重要的度僧戒坛，举行法会时“四方辐辏，僧尼繁会，观者如市焉。”<sup>⑥</sup>与此同时，僧伽信仰在其它地区也开始出现并逐渐流行，有的寺院开始供奉僧伽像，有的寺院则专以泗州命名。如唐景龙二年（708）江苏吴江建泗州寺，传为泗州大圣游化地。开元二十八年（740）宁波太平兴国寺有泗州像。还有湖南醴陵的泗州寺、福建长乐的泗州院、湖北云梦县的泗州寺、宁波方广教寺和福建厦门南普陀寺在唐代初建时也以泗州为寺名。<sup>⑦</sup>从全国范围来看，这时僧伽信仰的传播范围已达西北（陕、甘一带）、东北（燕师一带）、西南（汉南、四川一带）、东南（江淮一带）。<sup>⑧</sup>

僧伽道场的纷纷建立和信仰范围的扩展，不仅得益于统治阶级的扶持，还在于民间社会的推动，如韩愈在《送僧澄观》中写道“僧伽后出淮泗上，势到众佛尤恢奇。越商胡贾脱身罪，珪璧满船宁计资。”中国和域外的商人也是信仰僧伽的主要群体之一。据《唐语林》载，当时从事水利运输的人“必祭婆官，而事僧伽”<sup>⑨</sup>。伪经《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说六度经》的出现和流通，

① 参见杨健 《“僧伽大师与佛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综述》，《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3期。

② （宋）志磐 《佛祖统纪》卷四二，《大正藏》第50册，第372页上。

③ 同上，第384页上。

④ 同上，第387页中。

⑤ （宋）赞宁 《宋高僧传》卷一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大正藏》第50册，第822页上。

⑥ （唐）牛僧孺 《幽怪录》卷二之“尼妙寂”，明书林陈应祥刻本，中国普通古籍库电子版，第11页。

⑦ 林晓君 《泗州佛信仰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1页。

⑧ 王虎 《宋代僧伽信仰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1页。

⑨ （宋）王谠 《唐语林校证》卷八，中华书局，1987年，第726页。

也为僧伽信仰在民间的快速展开提供了很大助力。一般认为,该经始作于僧伽圆寂之后的唐代。经文首先介绍僧伽的身份,渲染其神圣性,自称僧伽本是释迦牟尼佛,与弥勒尊佛同时降世救人,然后讲述世间种种苦难和获得救度之后的美好景象。经文云“吾与弥勒尊佛同时下生,共坐化城,救度善缘。元居本宅,在于东海,是过去先世净土缘,为众生顽愚难化,不信佛法,多造恶业,吾离本处,身至西方,教化众生,号为释迦牟尼佛……吾身已后却从西方胡国中来生于阎浮。”<sup>①</sup>接着,连续讲“六度”,即六种可以获得救度的人,无非是强调遵守佛教戒律和儒家伦理,如戒杀戒偷、敬佛孝亲、乐善好施等。文曰“吾当度六种之人。第一度者,孝顺父母敬重三宝。第二度者,不杀众生。第三度者,不饮酒食肉。第四度者,平等好心不为偷盗。第五度者,头陀苦行,好修桥梁并诸功德。第六度者,怜贫念病,布施衣食,极济穷无。”<sup>②</sup>然后,劝人受持此经,并在最后传授一咒语。这部伪经是在佛教弥勒下生信仰、密教信仰等因素基础上受到儒家伦理思想和民间信仰影响之后产生的,是通过文本形式对僧伽信仰的内容和地位进行的一次中国化改造。正是因为这样简单易懂又颇具中国特色和神秘色彩的伪经,对民众有着很大亲和力及吸引力,创造了僧伽信仰在更广范围内进一步传播的便利条件,也为僧伽信仰在底层社会的流通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理论依据。该伪经又极大地抬高了僧伽的身份地位,为后世僧伽信仰在内涵和外延的扩充方面拓展了空间。

僧伽信仰能在唐代形成并得到较快发展,是因其具备了各个方面的因缘和条件。唐代整个社会崇佛风气和开放的民族心理是基本前提,僧伽本人的神异事迹和人格魅力是信仰基础,皇室、官僚和知识分子的支持推崇是强大助力,民众对神异感应信仰的喜好和需求是巨大动力。唐代也是僧伽信仰内涵特征塑造的重要时期。僧伽在世时多次显现神异并广为流传,圆寂后其灵异传说也不断累积,并得到社会各阶层不同程度的认可和解读,使得僧伽信仰从一开始就具有重视神异的特征。僧伽来自域外,但僧伽信仰产生于中国,是域外神僧这一佛教信仰载体被中国化之后的产物,也有人指出“僧伽信仰是僧伽致力推行佛教中国化的产物。”<sup>③</sup>总之,僧伽信仰自诞生之初,就受到了国家政权的影响和左右,继而与中国民众、中国文化紧密联系。

## 二、五代战乱中对护国信仰的需求促使僧伽信仰持续升温

历史进入五代,佛教仍然有所发展,但在整体地位和影响力上已远逊于隋唐。然而对于僧伽的信仰却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持续升温,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影响也不断扩大。王延彬独据建州称帝,“一旦大设,为伶官作戏辞云:只闻有泗州和尚,不见有五县天子。”<sup>④</sup>当时还出现“类僧伽”现象,对与僧伽的行迹特征相似的僧人都称为“僧伽”,只是在前面加上俗姓以区别泗州僧伽本人。<sup>⑤</sup>无论从伶官的戏谑中,还是从“类僧伽”的现象中,都可以看出僧伽信仰在当时的广泛流行。

五代时,僧伽信仰也与上层社会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一时期战火不断,各个政权相互征伐,而僧伽频频出现在征战场合。据《(至顺)镇江志》记载“周师攻淮甸,太师出援寿州,与刘仁贍相应,累有战功。初出援失利,虔祷于佛,感僧伽阴佑,乘单骑而殿归润州。僧伽预飞锡于厅中……太师乃以第宅并庄田地山四千九百九十六亩舍为寺业,建慈云因胜院,以大圣为开山

①② 《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说六度经》,《大正藏》第85册,第1463页下。

③ 孙应杰《僧伽生平和僧伽信仰考》,《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1期。

④ (宋)钱易《南部新书》,《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90页。

⑤ [日]牧田谛亮《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华宇出版社,1985年,第22页

焉。”<sup>①</sup>文中记载泗州僧伽助南唐军队顺利进军，太师林仁肇贡献出大量土地作为回报。又《宋高僧传》载“洎乎周世宗有事于江南，先攻取泗上。伽寄梦于州民，言不宜轻敌。如是达于州牧，皆未之信。自尔家家梦同，告之，遂降，全一郡生民，赖伽之庇矣。天下凡造精庐，必立伽真相，榜曰‘大圣僧伽和尚’。”<sup>②</sup>周世宗下诏全境寺院必立僧伽像，使得僧伽的影响范围得到扩展，以政府诏令的形式使僧伽成为华北、关中、淮南地区佛教信仰的必要元素。周世宗虽然后来有限制佛教的举措，但他曾担任开封府尹兼功德使，掌管佛教事务，熟悉佛教内部和民众信仰的情况，他有意推广僧伽，应该是考虑到僧伽在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影响而做出的决定。史料中尚有多处类似这样僧伽助战佑民的案例，可见护国佑民是当时僧伽信仰的一大主题。据《宋高僧传》，唐懿宗时僧伽就曾显示过警示兵难的神异，但当时这一功能并不突出。五代时期，战乱频发，僧伽信仰中帮助征战获胜的护国色彩得以彰显，并成为僧伽信仰中的主要内容。其实佛教信仰中还有毗沙门天王等其他一些具有护国色彩的信仰载体，但五代战乱中的多方割据势力选择僧伽作为护国神祇，与僧伽信仰在南方地区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有很大关系。而这种选择，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僧伽信仰。

五代时期，僧伽信仰在民间也有了新的发展。据王洋的《东牟集》记载，僧伽不仅保留着“禱病即痊”“大旱祈雨有感”等神职功能，而且又出现了“乞男女辄应”的送子功能和使商贾“获息倍称”的赐财功能。<sup>③</sup>神职功能的扩展为僧伽信仰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而越来越多的人信奉僧伽，一方面扩大了僧伽信仰的辐射范围，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僧伽信仰内容进一步被改造的进程。

五代时期的僧伽信仰在延续唐代僧伽信仰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从传播范围来看，在传播地域的广度和信仰阶层的深度上都有所增加；从信仰内容来看，五代僧伽信仰不仅继承了原有的祈雨、治水、救难、护航、医病等神职功能，更加突出了护国佑民色彩，同时又增加了送子、赐财等主题；从信仰特征来看，僧伽仍然在不断被神化，保持着其信仰的神异特征，感应故事的数量和类型有所扩充。在唐代作为高僧、神僧的僧伽，在五代时期进一步被神格化，满足了中国信众的更多信仰需求，增强了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感召力。

### 三、两宋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共同推动使僧伽信仰达到鼎盛

入宋后，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等条件为僧伽信仰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基础，使得两宋成为僧伽信仰的鼎盛时期。在政治层面，僧伽一直受到帝王官僚的重视；在文化层面，诸多文人雅士为僧伽信仰锦上添花；在宗教层面，不管是佛教精英还是普通信众，都对僧伽顶礼膜拜，到处都可以看到泗州僧伽的痕迹。正如黄庭坚在《山谷别集》中所说“僧伽本起于盱眙，于今宝祠徧天下，其道化乃溢于异域，何哉？岂释氏所谓愿力普及者乎。”<sup>④</sup>

宋代统治阶层对僧伽的赐封有加无已。宋太宗素崇释教，认为“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对僧伽继续扶持推崇。太平兴国五年（980），太宗“敕内侍卫钦往泗州修僧伽大师塔，凡十三层，改普照王寺为太平兴国寺。”<sup>⑤</sup>太平兴国七年（982），太宗再次“敕高品白承睿重盖其塔，

①（元）俞希鲁编纂，杨积庆、贾秀英等校点《至顺镇江志》，凤凰出版社，1999年。

②（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大正藏》第50册，第822页上。

③（宋）王洋《东牟集》卷一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77页。

④（宋）黄庭坚《山谷集·别集》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3册，第568页上。

⑤（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四，《大正藏》第49册，第397页上。

务从高敞，加其累层。”<sup>①</sup>又派内侍李神福“奉释迦舍利藏之（僧伽）塔下。”<sup>②</sup>雍熙二年（984），太宗封僧伽为“大圣文佛”，<sup>③</sup>在宗教身份的认可方面，对僧伽的推崇可谓已达极致。宋太宗在开国之初频繁地有意崇奉僧伽，除了个人因素外，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到需要利用僧伽信仰在当时社会上的广泛影响力来笼络人心、安定社会。太宗之后的真宗对僧伽也青眼有加，景德四年（1007）八月，真宗“遣使葺泗州僧伽塔，内出供帐什物给之。”<sup>④</sup>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接受太常礼院的建议正式将泗州普照王寺列入官方祭告和报谢对象。大中祥符六年（1013）六月，真宗又下诏“泗州僧伽大师，宜加号曰：普照明觉大师，其伽字公私文字不得指斥。”<sup>⑤</sup>僧伽的社会地位和宗教影响再一次被拔高。徽宗时期崇道抑佛，起初僧伽也在抑制范围内，朝廷封僧伽为“居济大士”，普照寺改名为神霄宫。据文献记载，后来因发生僧伽显灵救京师水患等事件，所以徽宗特赐僧伽六字师号，给予北宋时期在封神方面的最高称号。徽宗在躲避金军，逃难途经泗州时，又亲至僧伽塔下祈求护佑，史料载“上皇还京师，往来皆亲至泗州塔下烧香，施僧伽钵盂、袈裟，至亲着于僧伽之身。初，普照寺大半为神霄宫，至是经御笔画图以半还之，寺僧皆欢喜鼓舞。”<sup>⑥</sup>文献中僧伽通过显示神迹，得到统治者的推崇，在崇道抑佛的整体氛围中独获恩宠，显示了僧伽信仰在佛教信仰中的特殊性。北宋诸位帝王对僧伽的态度都基本延续太宗、真宗的路线，不断给予封赏。进入南宋后，高宗一改崇道抑佛政策，并数次亲自到普照寺参拜僧伽。尤其高宗在南逃中不拜神主宗庙却拜僧伽的行为引起了大臣许景衡等人的反对，显示了统治者对僧伽护国解难信仰的迫切需要和真实信奉。<sup>⑦</sup>后来泗州普照王寺和僧伽塔在战火中被毁，孝宗、理宗都曾大力扶持僧伽道场的新建和重修。

政治上的利用和皇家的扶持，是僧伽信仰在宋代全面发展并达到鼎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社会各阶层的推崇、歌颂也助力不少。文人阶层中有很多人对于僧伽表现出热情并给与颂扬。李昉等编写《太平广记》时专设“僧伽大师”一条，广录其事。蒋之奇撰《泗州大圣普照国师传》弘扬其人其事。北宋名臣王安石做《泗州塔谢晴斋文》赞曰“天灾于民，淫雨不止。袪除斋戒，并走以祈。实蒙等慈，俯应诚悃。永惟庇顾，其敢弭忘。”<sup>⑧</sup>一代文豪苏东坡也崇敬僧伽，做《泗州僧伽塔》《僧伽赞》《祈雨僧伽塔祝文》等多篇赞文，而且身体力行朝拜僧伽道场。南宋名臣李纲也是一位虔诚的僧伽信徒，他被贬至福建沙阳时曾写《书僧伽事》，对僧伽的神力大加赞颂，而且亲述经历，宣扬僧伽的灵验和神力。文载“世传僧伽为观音大士化身，其神变示现之迹载于传说，着于耳目，不可胜纪。予独书其近年亲所见闻者三事……。”<sup>⑨</sup>还有黄庭坚、陆游、洪迈等人也曾辑录过僧伽相关的神迹故事。

宋代以来，禅宗独秀，成为佛教的主流。僧伽信仰虽然洋溢着浓厚的民间信仰色彩，而且其信仰的主要特征是禅宗不主张甚至反对的“神异”，但是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当时禅宗对僧伽不

①（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大正藏》第50册，第822页上。

②（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四，《大正藏》第49册，第397页上。

③（宋）觉岸《释氏稽古略》卷四，《大正藏》第49册，第860页中。

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六，中华书局，1980年，第1478页。

⑤《宋大诏令集》卷二二三“泗州僧伽大师加号普照明觉大师伽字公私文字不得指斥诏”，大中祥符六年六月壬子。或见（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五八之一一五，中华书局，1957年。

⑥（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七，中华书局，1998年，第122页。

⑦（宋）许景衡《乞罢临幸普照寺塔烧香指挥奏》，《全宋文》卷三〇九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323页。

⑧（宋）王安石《临川文集》卷四六“泗州塔谢晴斋文”，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5册，集部44，第352页。

⑨（宋）李纲《梁溪集》卷一六〇“书僧伽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6册集部65，第701页。

但没有排斥，反而纳入其体系，成为禅宗公案中的重要人物之一，被赋予禅宗特有的思辨色彩。禅宗的机锋妙语中经常会以僧伽为契机，如《五灯会元》载“问‘泗洲大圣为甚么杨州出现？’师曰‘业在其中。’曰‘意旨如何？’师曰‘降尊就卑。’曰‘谢和尚答话。’师曰：‘贼是小人，智过君子。’<sup>①</sup>又如《续传灯录》载“问‘莲华未出水时如何？’师曰‘西瞿耶尼。’曰‘出水后如何？’师曰‘泗洲大圣。’”<sup>②</sup>更多的则是利用僧伽的国籍问题作为契机，推敲参悟，如《先觉宗乘》载“乌龙曰‘大圣本不姓何，亦不是何国人，乃随缘化度耳。’公笑曰‘大圣决定姓何，住何国。’如是往返数次后，致书于大慧乞断此公案。大慧曰‘有六十棒，将三十棒打大圣，不合道姓何。三十棒打济川，不合道大圣决定姓何。若是乌龙长老，教自领出去。’<sup>③</sup>当时还有僧人崇拜僧伽到达狂热，甚至焚身供养，赞宁《宋高僧传》之《大宋临淮普照王寺怀德传》记述了僧人怀德焚烧自身供养僧伽，而且得舍利若干的场面。<sup>④</sup>另外还有将僧人身份演绎为僧伽转世以抬高地位的现象，如《闽中书画录》记载高僧从登，“母梦泗洲僧伽愿为己子，十四月乃孕，数岁不育。又梦僧伽曰：七日吾复来。后十年七月七日生。”<sup>⑤</sup>

这一时期，僧伽信仰进一步民间化、职能化，并与各地的地方性信仰结合，产生许多新的故事，也附加于僧伽更多的神职功能，使僧伽的形象更加饱满生动，使僧伽信仰的内容更加丰富。江淮一带水神众多，在灾患特别严重的泗州，普遍流传着泗洲大圣锁水母的事迹。《泗州志》记载“巫支祁屡为水患，僧伽大圣驻锡泗州，说法禁制，建灵瑞塔，淮泗乃安。”其实故事原型出于大禹锁巫支祁的传说，而后来民间以僧伽代替大禹，成为当地水神，流传甚广，还演化出很多文学创作。僧伽保佑科考的功能在宋代得到彰显，如《孙公谈圃》记载乔执中因父亲“素事普照像甚严”，“遂中第”。<sup>⑥</sup>还有《夷坚志》中记载了尚书张彦文携子向僧伽求签祈祷，后果然中第之事。<sup>⑦</sup>在某些地区，僧伽还担负着保佑婚姻的神职，所以被称作“爱神”。另外还有送子、度亡、驱鬼等等神职功能。总之，宋代时期，僧伽的神职功能得到极大扩充，五花八门，有求必应。

在社会各方面的推动下，两宋时期僧伽信仰全面展开，僧伽道场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出现，甚至开始远播国外。江淮地区一直是僧伽信仰的中心地区，这一时期僧伽道场几乎遍布东南沿海的江浙、福建一带。苏州、无锡、杭州、建康、温州、江陵、常州、瑞安、宁波、舟山、嘉兴、太湖、海宁、通州、泉州、莆田、平湖等地都有供奉僧伽的寺院和专以泗州为名的泗州寺、泗州塔、泗洲堂、泗州院等。除了东南沿海，围绕中原河南一带，北到河北、山西，南至江西、湖南及西南四川、云南玉溪一带，西至陕西、甘肃等地，都相继出现过僧伽道场，<sup>⑧</sup>不止国内僧伽道场遍布，僧伽信仰还突破国界，传向周边国家。神宗年间（1048—1085）日本国僧人成寻来中国参学，从其日记中可知他参访过很多僧伽道场，而且回国时将僧伽画像和僧伽传记等带到了日本。<sup>⑨</sup>“新罗时期僧秀泰首次建立僧伽寺，并在在高丽、朝鲜时期多次修建，目前仍然伫立于韩国首尔北汉山上。寺内供奉着高丽显宗时（975—981）建铸的结伽跌坐的等身高僧伽大师像，

①（宋）普济编《五灯会元》卷一八，《卍新续藏》第80册，第369页下。

②（明）居顶《续传灯录》卷一一“大鉴下第十二世云居舜禅师法嗣”，《大正藏》第51册，第529页下。

③（清）圆信校订，郎凝之汇编《先觉宗乘》卷二“宋给事冯揖（嗣法龙门远）”，《卍续藏经》第148册。

④（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大正藏》第50册，第822页上。

⑤（清）黄锡蕃《闽中书画录》卷十四，合众图书馆丛书本，民国三十二年版，第115页。

⑥（宋）孙升《孙公谈圃》，《全宋笔记（二）》，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52页。

⑦（宋）洪迈《夷坚志》之“建昌大寺”，中华书局，2010年，第1478页。

⑧ 参见王虎《宋代僧伽信仰研究》附录三“宋代僧伽信仰分布范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64—68页。

⑨ [日]成寻《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13—514页。

受到众多信徒的敬仰。”<sup>①</sup>

当然，僧伽信仰作为极具灵异色彩的佛教信仰，也曾遭到部分儒家和道教势力的强烈排斥。比如程颢、张栻、黄震等理学家批判僧伽相关的鬼神灵异，并对僧伽崇拜活动和僧伽道场及造像进行实际性的打击。但这种压力和排斥并没有对僧伽信仰的广泛流行和进一步融入中国社会的进程造成很大影响，连奉宋徽宗命为泗州僧伽像加道士冠的泗州太守也在僧伽像前拜称“僧伽有神，吾不敢强。”<sup>②</sup>由此可见当时僧伽信仰的坚实基础和巨大影响。也正是在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互相激荡、摩擦的过程中，僧伽这一佛教信仰载体的中国化程度不断加深，僧伽信仰更加深入、广泛地走进了中国社会生活。

从外在形式来看，“世传僧伽为观音大士化身”<sup>③</sup>的观念已成共识，僧伽信仰与观音信仰紧密联系，两者的发展基本保持着相同的路线和风格，内容也极为相似，貌似僧伽在发展过程中被赋予很多观音的品格。而究其实质，两者都是佛教信仰载体的持续“中国化”，僧伽和观音一样，被赋予的其实大多都是中国上层社会的统治需要和底层民众的信仰需求，以及中国的文化特征。

#### 四、明清时期其他信仰的吸收与消解使僧伽信仰转型并衰落

宋代之后的佛教进入新的转型期，佛教在义理创新方面逐渐走向衰弱，但在信仰层面继续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佛教信仰形态。中国思想界整体格局以儒家为主体，佛道两家主动靠近，出现三教融合的文化氛围。佛教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和社会地位中进一步通俗化、简易化、民间化、功利化，并且不断向儒家、道家、民间信仰继续渗透。明清时期的僧伽信仰在整体上与当时的佛教发展趋势和文化氛围保持一致，开始向其他形式转型，但难免呈现衰落态势。

僧伽大圣与道教、民间信仰结合，开始以其他身份频频出现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在各地转型为中国民间俗神之一。清代周亮工《闽小纪》卷三“僧伽”条云“福州城内外，凡巷口皆筑小屋，祀泗洲菩萨，人皆未晓其义，或有一二处求答祈签，往往灵验。”<sup>④</sup>明清时期，在福建一带出现了遍布大街小巷的供奉“泗洲佛”或“泗洲文佛”的小神龛。泗洲大圣锁水母的故事对《西游记》中孙悟空和南瞻部洲盱眙山鬻城大圣国王王菩萨的塑造也有影响。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与僧伽相关的另一部伪经，即《五公经》。该经假借天台山志公、化公、朗公、唐公、宝公等“五公菩萨”之名，糅合佛教“末法”观念，宣扬末世浩劫中人必须通过诵经画符才能消灾免难。泗州僧伽是五公之一，同样善于预言未来、画符消灾。<sup>⑤</sup>与《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说六度经》相比，《五公经》言语粗陋，颇具煽动性，而且带有威胁语气，其中对僧伽信仰的改造也更加直接、大胆，内容与民众生活更为贴近，而且僧伽与多位菩萨、圣人组群出现，更容易满足不同的信仰情感和需求。现存《五公经》版本不下三十种，可见其流传之广。

道教也将僧伽纳入其信仰体系，作为一些科仪中的神灵。《道法会元》是元末明初编纂的一部道教类书，其中《神霄遣瘟送船仪》和《神霄遣瘟治病款法》等是现存最早的遣瘟送船科仪文本，也是宋代以来道教神霄派用来驱散瘟疫、治疗疾病的常见做法。《神霄遣瘟送船仪》中“泗州普照明觉禅师”便是拜请的众多诸神之一。在《神霄遣瘟治病款法》之《造遣瘟神船法》

① 林晓君《泗州佛信仰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

②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4页。

③ (宋)李纲《书僧伽事》，《全宋文》卷三七六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94页。

④ (清)周亮工《闽小纪》卷三“僧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7页。

⑤ 王见川、林万传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第260-350页。

中，“泗州大圣”则成为该仪轨中祈求的主要神灵。《正一道门庆麻痘娘科》《安神正一科》《攘痘疹全集》等道教科仪中也都有与泗州僧伽相关的名号。霞浦县畚族闾山教道坛“娘奶行罡舞”的“龙角铃刀舞”中也有“外坛四洲王”的身影。<sup>①</sup>

僧伽信仰虽然在与中国宗教、民间社会的深度交往方面有所发展，但是总体上呈现出传播广度的极度缩减和崇拜热度的迅速降温。根据相关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全国各地也新建和重修了一些僧伽道场，但是数量比较前代已经明显减少。尤其是僧伽的根本道场所在的泗州城在清代时水灾频发，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更是全部沉没于洪泽湖下，直接影响了僧伽信仰中治水救灾这一信仰基础。此后，僧伽信仰在佛教信仰中逐渐湮灭，在民间信仰中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僧伽相关的寺院、塔庙也逐渐减少，最终鲜为人知。曾经长期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僧伽信仰为何一蹶不振以致湮没无闻，有人认为僧伽信仰衰落的根本原因是泗州城被水淹造成其信仰基础的削弱。<sup>②</sup>也有部分学者提出，是因为普陀山道场的兴起并确立为观音菩萨的主要道场，影响了泗州普照王寺道场的权威地位和影响力<sup>③</sup>。也许，普陀山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削弱了泗州普照王寺的影响力，泗州城被淹也确实对僧伽信仰有所撼动，但对于曾长期在广大区域内以丰富的神职功能而备受各阶层热情崇拜的僧伽信仰来说，其衰落的原因更为复杂、深刻。

本文认为持续千余年的僧伽信仰渐至湮灭，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中国佛教整体衰落的大环境下，泗州被大水淹没，致使以治水患而闻名的僧伽大圣的信仰基础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第二，明代以来对宗教管控的力度加大，尤其是对具有个人崇拜色彩的宗教信仰进行了多方面的抑制，这对以神僧崇拜为基础，以灵异感应为特征的僧伽信仰有很大影响；第三，清代统治阶级对藏传佛教的信奉和重视，使国家层面和上层阶级对僧伽信仰的依赖和崇拜大大减弱，僧伽信仰失去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第四，明清时期中国文化氛围发生转变，佛教文化在思想界逐渐被边缘化，加上僧伽信仰浓厚的民间色彩，致使文人阶层对僧伽的喜好大大减弱；第五，僧伽信仰在明清时期与佛教、道教、民间宗教中其他信仰不断融合，成为民间俗神之一，但在理论层面却几乎没有任何扩充和更新，使僧伽在与正统佛教逐渐疏远的同时，被其他信仰吸收和消解，失去了独特地位和信仰特色；第六，以观音信仰为主题的浙江普陀山的崛起，代替了泗州普照王寺在南方宗教道场中的权威地位，作为另外一种佛教信仰的地域载体，快速吸引了广大信众的关注；第七，与普陀山崛起相应的是观音信仰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全面铺开和深入传播。观音信仰具有全方位的神职功能，能够满足多层次的信仰需求，可以说僧伽大圣所具有的神职功能，观音菩萨全部具备，但观音菩萨所具备的理论支撑和神职功能，则远非泗州僧伽所能周全。而且僧伽历来被认为是观音的化身，虽然在民间有“泗洲佛”的尊荣，但在正统佛教中，僧伽从未超越过观音的地位。所以，传播范围更广泛、信仰内容更丰富、与中国社会交涉更深刻的观音信仰取代僧伽信仰是自然而然的。以上七个方面的原因共同作用，最终将盛极一时的僧伽信仰推向了默默无闻的境地。

## 五、结语

僧伽信仰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衍变，起于域外却盛于中土，兴自佛教却广

① 林晓君 《泗州佛信仰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77-80页。

② 同上，第76页。

③ 林斌 《泗洲大圣信仰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兼对岑港出土石像考证》，《舟山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王自夫 《北宋日僧眼中的东岱山》，《舟山乡音报》，2004年11月10日；学思 《佛教在民间——以僧伽大师弘化事迹为例》，载谭伟伦主编《民间佛教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

布民间。从其兴衰轨迹来看,僧伽信仰在唐代兴起并有了初步发展,五代战乱中持续升温并得到巩固,两宋时期全面发展并达到鼎盛,明清时期发生转型并渐趋没落,最终归于沉寂。从兴衰的原因来看,僧伽信仰在唐代兴起之初是对域外神僧的崇拜,表现出自身独有的特色和价值,同时契合中国民众的信仰需求,在开放的民族心理和热情的崇佛氛围中,僧伽信仰得到政权的大力推动,因此得到很快发展。五代战乱中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和笼络人心的考虑,一再张扬僧伽信仰的护国色彩,使僧伽信仰在持续升温中得到巩固。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佛教发生重大转型,从重视哲学思想的义理型的佛教逐渐偏向简易化、民间化、神圣化的信仰型佛教。僧伽信仰沿着中国化的轨迹,适应中国民众宗教情趣的变迁,不断地深入中国文化、民间社会,形成了以神僧崇拜为基础,以灵异感应为特征,集救难、治水、护国、愈病、遣瘟、助考、赐爱等等神职功能于一身的超人间力量崇拜,广为流传。直到清末,由于统治阶层态度的变化,文化氛围的转变,观音信仰影响的扩展,以及道教信仰、民间信仰的逐步消解等原因,僧伽信仰转型成为民间俗神崇拜,并慢慢被代替,甚至被遗忘。

僧伽信仰的发展轨迹反映了中国佛教信仰重心的转移和中国民众宗教信仰情趣的变迁。也由此可见,一种外来的宗教信仰或信仰载体的命运与国家的政治氛围、文化发展、民众需求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责任编辑:李 想)

## 书 讯

### 《宗教与历史(第十二辑)》

陶飞亚、程恭让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3月,292千字。

《宗教与历史(第十二辑)》集中于佛教历史文化研究,包括佛教中国化研究、佛教历史与文化研究、书评三个栏目。本辑所收录的文章,从不同角度丰富和拓展了佛教中国化这一中国宗教史研究中的古老问题,并对佛教文献经典、佛教思想义理、佛教宗派发展等研究领域进行了深入挖掘,聚焦当前学术前沿问题与方法,展示了当代中国佛教研究者的学术特质。